

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中国
社会
语言学

2011年第1期
(总第16期)

中国社会语言学



<http://acs.whhit.org>

 商务印书馆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11年第1期(总第16期)

《中国社会语言学》编委会编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11年第1期/《中国社会语言学》
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7-100-09080-3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社会语言学—中国—
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696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O SHEHUI YUYANXUE

中国社会语言学

2011年第1期(总第16期)

《中国社会语言学》编委会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080-3

2012年6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理论分析

- 语言与空间移动 董 洁 扬·布龙马特 1
语言舆情热点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孙曼均 10

语言生活状况调查

-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经营户语言状况个案研究 毛力群 20
中学生语言生活状况城乡对比研究
——以青岛和潍坊为例 刘 芳 33
中国城镇居民外语能力需求调查 鲁子问 张荣干 44

语词与社会

- 澳门“圆形地”研究 黄 翊 58
“爱就宅一起!”
——台湾“宅”类新词语透视 陈淑芬 陈力绮 72
汉语缩略词构词规律的社会心理实证性 陈崧霖 83

多语状况调查

- 澜沧拉祜族语言生活中的双语平衡问题 朱艳华 乔 翔 95
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公务员语言使用状况调查
——兼论多语多方言区的普通话推广 王远新 108

- “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二届学术论坛”在商务印书馆召开 19
商务印书馆举办 2011 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 43
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57
第六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在锦州召开 82
第八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征稿通知(第 1 号) 107
稿约与稿例 120
致谢 124
2012 年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评审工作启动 封三

CONTENTS

Theory Exploration

- Language and Movement in Space* Dong Jie & Jan Blommaert 1
- On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f the Language-related Public
Opinion* Sun Manjun 10

Language Situation

- The Case Study of Operators' Language Situation in Yiwu of the China
Commodities City* Mao Liquan 20
-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Language Situ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iu Fang 33
- National Survey of Foreign Language Needs in China :
Urban Analysis* Lu Ziwen & Zhang Ronggan 44

Words and Society

- Research of Macau's "Roundabout"* Huang Yi 58
- "Love is to Zhái(宅) Together!": A Study of the Neologism "Zhái" in
Taiwan Mandarin* Chen Shu-fen & Chen Li-chi Lee 72
-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the Abbreviations in Chinese
Morphology* Chen Sung-lin 83

Survey on Multilingual Situation

- The Bilingual Balance of Language Life of Lahu
in Lancang* Zhu Yanhua & Qiao Xiang 95
- A Survey on Civil Servants' Language Situation Based on Chengbu Miao
Autonomous County; Concurrently on the Spread of Putonghua in the
Multilingual and Multidialectual Areas* Wang Yuanxin 108

语言与空间移动*

董 洁 扬·布龙马特

提要 本文着重探讨两种社会语言学研究模式。第一种可称为“分布性社会语言学”，旨在研究一种静态、固定、平面空间内的语言分布和语言变异。第二种是“移动性社会语言学”。在该模式中，语言被视为交际资源的动态复合体。这些交际资源跨越时间和空间，在不断移动中互相发生作用。第二种模式能够准确地描述全球化过程中涌现的社会语言学新现象。与第一种模式相比，更具创新性、更贴近语言生活的实际。

关键词 全球化；空间；层级；移动性；社会指向；民族志研究

1. 引言

当提到全球化现象的时候，历史社会学家以曼纽·沃伦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曾说：

如果我们仅把全球化和恐怖主义限定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我们的认识就会像新闻报道一样短暂。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真正意义以及它们的起源、发展过程，更重要的是，它们如何在宏观的社会层面起作用。(Wallerstein, 2004: ix)

沃伦斯坦指出，全球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一直以来我们都在社会学的不同学科领域中研究这些问题。而在这些领域中，同一社会现象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Wallerstein, 2004: ix)。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超越现有的学科界限来全面理解全球化过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更精准的理论模式，不断重新审视和修正我们所使用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Blommaert, 2010; Dong, 2011)。

全球化研究是社会学中的一个热点命题。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world-systems

* 本文部分内容译自 Blommaert & Dong (2010a)。中文稿为第七届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青海民族大学, 2010年7月)主旨发言之一, 得到高一虹、周庆生、张维佳、徐大明等多位学者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特此致谢。

analysis)”打破学科壁垒,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全球化进程。霍布斯鲍姆(Hobsbawm, 1987)侧重研究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的形成和两次革命(the due revolution,即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对当代全球化社会的影响。相对而言,社会语言学涉及全球化研究领域比较晚。德斯万(De Swaan, 2001)尝试为全球化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建立理论框架。克雷斯(Kress, 2003)探讨了全球化进程下新媒体的普及,以及新媒体在人们多模式(multimodality)交际行为中的影响。库普兰德(Coupland, 2003)描述了语言的跨国流动,以及全球化对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柯林斯等(Collins, Slembrouck & Baynham, 2009)通过大规模移民现象解读全球化进程和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语言学者也在关注全球化和社会语言生活之间的关系。周庆生(2007)调查了北京奥运会国际大型赛事中出现的社会语言现象以及它们对北京社会生活的影响,探讨了语言政策的制定问题。高一虹(Gao, 2010)探索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英语学习者身份认同的构建情况。本文描述了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模式,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模式和一系列新概念,并辅以语料分析例证,以期充分理解全球化带来的语言生活新问题。

2. 全球化与社会语言学的两种研究模式

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应当被看作是广义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一部分。确切地说,广义的全球化至少在19世纪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而19世纪正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Hobsbawm, 1987; Wallerstein, 2004)。当今全球化尽管被冠以“全球化”这一新名称,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只是找到一个更贴切的词汇来描述它——“全球化”这个词能形象地描述人、货物、信息、资本频繁快速地跨时空流动。这种流动已经在人类社会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我们现在能够更准确、更透彻地描述它、研究它。互联网和其他远程通信技术使我们感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其实,当年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的发明也曾经给人们带来同样的震撼。这些早期的科技进步对人们的语言以及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变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Hobsbawm, 1987)。但是,由于我们常常从语言本身的角度而非社会角度来理解语言现象,因此会把语言现象局限在它的即时情境,因而忽略了它的历史性。如果单从语言本身的角度出发,语言现象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即时性。这种偶然性和即时性削弱了语言现象在宏观社会层面的重要“指向(indexical)”意义。“指向”是社会语言学中新兴的一个重要概念,该概念描述微小的语言特征与宏观层面社会意义之间的必然联系。换言之,微小的语言特征指向(index, or point to)人们的身份、社会阶层、教育背景、年龄、性别等社会意义(Silverstein, 2006; Hymes, 1996)。

19世纪末20世纪初,描写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是语言学界的主流。但是,它们把语言与其使用者所生活的时代剥离开,把使用者限定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Blommaert, 2006)。在涉及时间概念的情况下,传统语言学倾向于使用谱系模型(genealogical models);当涉及空间概念的时候,空间常被描述成是水平空间。在这种水平空间中,语言被形容成“分布”。现代社会

语言学常常把这一理论框架运用到研究现实语言生活中来。比如,语言变异的研究经常专注于语言扩散,即语言变量在水平空间里的传播和分布。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因此趋于表面化,通常专注于一代人及其下一代人之间的语言传承(时间),以及地区间的语言变量分布(空间),如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语言变异。但是,人们并非静止不动。在全球化过程中,人们频繁进行空间移动,其语言资源和社会语言资源也随之移动。因此“静止的”语言模式与“移动的”语言模式密不可分。它们各有特长,相互补充,共同发生作用。例如,现在的移民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电话、网络与家乡联系,这种现象导致了散居社群(diaspora)中不同程度的语言创新和语言保持(Blommaert, 2010);小语种和一些边缘语言在某些特定的语言环境下可能重新成为热门语言(Heller, 2003);嘻哈音乐(Hip Hop)、瑞格音乐(Reggae)等流行文化正成为一些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载体(Pennycook, 2007)。所有这些语言移动现象最终都体现在人们实际的社会交际互动行为之中。多语模式和多语结构因全球化而变得更加复杂,亟须进行充分的描写和研究(Dong & Blommaert, 2009)。

在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观察到两种研究模式。一种已经确立了,另一种正在形成。已经确立的模式即上述“分布性社会语言学(a sociolinguistics of distribution)”。在这一模式中,语言资源移动是在水平的、固定空间里发生的。这一研究模式的纵向维度通常是阶级、性别、年龄、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传统分层,它们将研究对象固定在某一清晰界定的空间里。另一个模式即本文提出的“移动性社会语言学(a sociolinguistics of mobility)”。它不仅研究某一空间中的语言,更研究在不同时空框架之间频繁移动的语言,以及这些时空框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我们称这些时空框架为“层级(scales)”。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把语言的使用看作是在不同层级上进行的(Blommaert, 2005、2007; Dong, 2011)。层级这一概念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纵向的空间排列:好比有一个纵向的轴,轴上分层次地排列着许多空间,从本土到全球,从暂时到永久,从特殊到一般……两极之间又有许多中间层。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纵向跨越,比如从一个较低层面的空间跨越到一个较高层面的空间,都涉及资源占有和权力重新分配问题,然而资源占有和权力分配通常不均衡(Dong & Blommaert, 2009; Dong, 2010a)。例如,若要从本土层面移动至全球层面,若要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之中,就必须掌握英语资源。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说一口流利、纯正的标准英语,换句话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接触到标准英语这一资源、并成功占有这一资源。很多人由于没能占有这一资源,而无法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之中。同样,进入某一层级,能在这一层级上实现交际的能力也是不均衡的。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在某一层级上运用语言、进行交际。层级概念批判性地扩展了传统的“轨迹”、“流动”等概念。它着重强调语言的“指向”意义,以期更好地研究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学课题。

第二种模式面临很多挑战。挑战之一就是如何从理论层面重新理解“空间”概念。在移动性社会语言学中,空间不是被动的,它能够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主动作用。约翰·甘柏兹

(Gumperz, 1982: 145 - 162)很早就指出,语言及其使用者的空间移动会对他们的社会生活产生种种影响。比如,当人们在国外旅行时,一个很会说话的人也许突然变得不会说话了,甚至连问路或者叫出租车这样基本的交际行为都不能完成。出现这种交际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交流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空间发生了变化,新空间要求他们以新方式使用语言。空间的变化导致人们的“语言库”(linguistic repertoire,即一个人所能调动和使用的全部语言资源)与他们所处的环境脱节,进而使人们在新空间中的交际力不从心。人们总是在某一空间发出话语,空间不是中性的,也不是被动的,而是充满了价值取向、社会秩序、权利分配以及情感归因(Dong, 2010a)。它使人们在交流中随着话题的改变、交谈对象的改变而变换口音、语言风格,而口音、语言风格的变换也赋予了交流双方不同的身份。因此,一个空间相对于其他空间来说是有意义的。这些空间纵向排列,每个水平的空间(如街道、区域、国家)也同时是一个“垂直”的空间。所谓“垂直”,并非空间意义上的上下之分,或时间意义上的先后之分,而是在这个垂直的空间里充斥着各种社会、文化、政治的区隔(Bourdieu, 1984: 1 - 8)。在下文案例中我们会看到,这些区隔是具有“指向性(indexical)”的区隔:微观语言层面上的细小差别“指向”其在社会、文化、政治等宏观层面的意义和价值;语言差异由此转变成社会差异和社会不平等(Silverstein, 2006; Agha, 2007; Blommaert, 2005; Dong, 2010b)。每一个空间都包含有“指向秩序”——由语言使用和社会规范而建立起来的复合体,围绕着这些复合体产生诸如“好”“坏”、“对”“错”、“土”“时尚”“酷”、“合适”“不合适”等价值判断。“指向秩序”界定了人们的归属感、身份认同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所跨越的空间从来都不是空白空间。空间总是属于某些人的空间,空间总是充斥着各种规范、期待、理念。人们的频繁移动导致语言的不断交流、碰撞、融合。在这一移动中,语言常常“泄露”使用者的身份;口音、习惯用语等语言特征“指向”使用者在宏观社会层面的身份认同。

中国30年来持续不断的“民工潮”现象为移动性社会语言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研究素材。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大、中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俗称“民工潮”。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携带”着各自不同的语言、方言、口音,在城市生活中频繁接触、交流,给城市的语言生活面貌带来了巨大冲击(付义荣,2010;夏历,2007;曾炜,2006;Dong, 2009)。同时,城市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普通话也时刻改变着农民工的语言库。为了在城市中生存、发展,农民工必须掌握和熟练运用普通话。同时,他们的语言库中还保留着家乡方言或民族语言。在和家人、同乡交流时,家乡话往往是他们的主要交际语言。人在异乡,说家乡话能使交谈双方感到亲切、热情,加强彼此的感情。另外,随着建设国际化都市进程的逐步推进,英语也加入到人们的语言库中,使本已复杂的语言生活更加复杂化、多元化。英语不仅成为大多数城市中产阶级掌握和支配的语言资源,也影响着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下面的语料来自北京城区一隅。它体现了多种语言资源在同一时空存在、对不同言语行为对象发挥不同作用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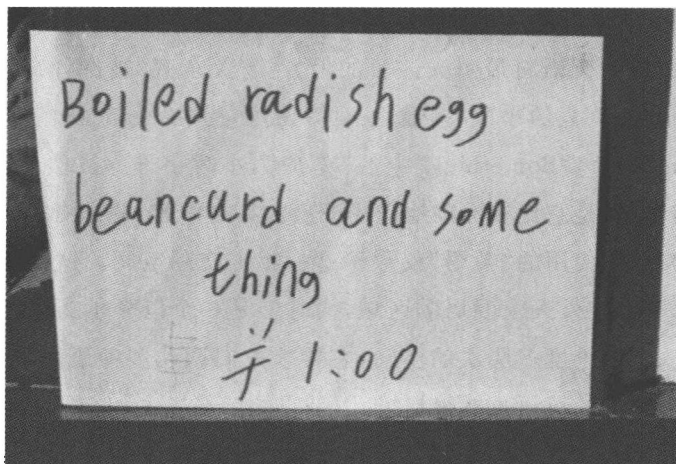


图1 关东煮

图1展示的是作者2008年在北京进行民族志田野调查时采集到的语料。民族志(ethnography)是一种研究方法,同时也是一种研究角度。它要求研究人员使用较长时间“沉浸”到目标人群,以期深刻理解和掌握该人群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实践逻辑(Blommaert & Dong, 2010b: 26-29)。民族志研究认为,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而语言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孤立存在。只有多维度、多层次、动态的研究才能充分还原语言生活的“原生态”面貌,进而揭示其社会本质。民族志能够满足密切结合实际这一研究需求,避免用简单的公式、数据套用复杂的社会语言现象。

本研究的宏观社会环境是国内大规模的移民潮以及中国日益深入的国际化进程。语料采集工作是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结束不久后进行的,当时北京随处可见奥运会的标志和广告宣传牌。为了奥运会的顺利召开,北京大街小巷的标牌、指示牌都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统一规范和整顿。本文语料虽然采集于公共场所,但并非官方标牌,而是受访者自制的标牌,未经任何部门批准,属于“草根文化”。该标牌的制作人(田野调查的受访人)是一位农民工,在北京高等院校集中的区域出售一种叫做“关东煮”的街边小吃。由于留学生是“关东煮”摊位的主要客户群,因此摊主用“英文”将他的产品广而告之。

该标牌传递给我们多方位、多模式的(multimodal)信息,不仅是语言本身所传达的意义,也包括丰富的视觉信息。广告牌的大部分空间都被英文占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英文字母的书写。字母的大小、摆放很不规范,看似小学低年级学生的书写。即便是英语初学者,由于早期受到汉语拼音的书写训练,字母书写也可以做到比较娴熟、整齐。由此可见,摊主的学校教育较少,文化程度不高,幼稚的书写手法指向(index)书写者较低的文化程度。最后一行关于价格的写法也印证了这一推论:书写者似乎混淆了金额的书写方式和时间的书写方式。有趣的是,在广告牌左下方用不同颜色的笔注有中文“串”字,似乎是后添加上去的,用以辅助解释英文内容。可见摊主的顾客不仅是留学生人群,也包括中国学生。这块看似简单的广告牌其

实并不简单。

广告牌中的英文是整个语料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关东煮”被翻译成“Boiled radish eggs beancurd and Something”(煮的小萝卜、蛋、豆腐等物)。其中“beancurd”的正确拼写方法应为“bean curd”或“bean-curd”,“Something”中的“S”应为小写字母。虽然英文翻译让人啼笑皆非,其中又有拼写错误,但是它比较准确地描述了该食品的内容:关东煮是由煮红鸡蛋、豆腐及其他食材组成的。摊主所使用的“英语”仅限于这一特定交际空间。这是一个怎样的空间呢?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一个中外人士混居的区域,同时又是一个以学生为主的地区,很多农民工在此地谋生。这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空间,它要求人们调动多种语言资源,从方言到英语,从本土到跨国。广告牌上的英语虽然很初级,但是它能满足摊主的交际需求,使摊主成功地和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做生意。成功的交际也使摊主对自己的语言能力和生存能力感到满意,由此产生一种自豪感。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全球化过程中一位农民工尽可能地调动他的语言资源和交际能力谋求生存和发展。他所生活的空间是动态的空间。他的移动过程涉及一系列空间,在不同的空间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交际。摊主的语言库至少有三种语言资源:家乡话、普通话和英语。这三种语言资源指向三种不同的空间——家乡、城市、国际化空间。这三种空间处于不同层级,从本土层级到国际层级,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跨空间的移动同时也是跨层级的移动。要实现跨越层级的移动,尤其是从较低层级跨越到较高层级,人们就必须能够占有和支配相应的资源。在老家时,方言能够满足摊主在许多场合的交际需求。来到北京,方言很大程度上被局限在私人空间,成为家庭中、老乡间、与家乡的亲友联系时使用的语言。换言之,空间发生转换的同时,语言的有用性、重要性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从老家到北京的生活空间的变换中,老家方言的重要性和有用性下降,普通话取而代之成为他生活中的主要语言。熟练使用普通话这一语言资源是受访人在北京生存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他能够成功地和外国人做生意,占有和支配英语这一国际语言,哪怕是只言片语,也是非常必要的。北京是一个多元化的空间。在全球化社会大背景下,英语不仅影响着“精英阶层”的语言库,也进入到这位普通农民工的日常生活。这凸显了全球化对语言的影响已经深刻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纵观本案例阐述的全球化进程和语言状况,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分布性社会语言学很难解释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语言现象。首先,我们无法准确地定义所分布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讨论的不再是固化的语言,而是动态的语言及其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其次,由于资源分配从来都是不平等的,我们需要创造新理论和新词汇来描述这些资源。本案例中受访人使用的英语只能在他所生活的层级有效使用,一旦跨越层级,比如进入学校教育层级,这种英语就失去效用,成为“糟糕”的英语了。有些语言资源使人们具有跨越不同空间和不同层级的能力,而另一些语言资源就不具备这种能力。比如普通话是跨地域的语言,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可以被用于多种不同场合,而地区方言就有很大局限性。因此,有些语言资源只能在某些层级上使用,而

不能用于其他层级；在一个层级上有效的语言在另一个层级上可能就失去效用了。本文阐述和运用的层级的概念、指向意义、语言库等都是移动性社会语言学中新出现的重要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理解复杂多变的社会语言现象。

3. 结语

本文开篇提出一“新”一“旧”两种研究模式。旧模式即传统的“分布性社会语言学”，它研究静态的语言分布和语言变异现象。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发掘新理论来研究语言和空间移动。语言的移动性是问题的核心，它能够充分、系统地描述交际行为在多层、多维度的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很长时间以来，语言被看成是固定于某一时间地点、从属于某一即时环境的事物。对语言的这一认识虽然非常重要，却有失片面，因为语言同时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它超越地域，随着人们的移动而跨越空间和时间。人们不单单通过语言构建本土性，也通过语言实现空间移动和社会阶层的上向流动。这就是我们所探讨的第二种模式——“移动性社会语言学”。本文旨在提出这种新模式，描述它在社会语言研究中的巨大潜力，并阐述和运用了一系列创新概念，用以分析和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语言新现象。

移动性社会语言学为我们带来一些新问题和新思考。首先是它对“言语社区”概念的影响。中国学者在言语社区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徐大明，2004、2008、2010；蔡冰，2008；王玲，2009）。在全球化的社会情境下，说者与听者也许属于同一言语社区，但只是暂时的。言语社区的传统定义假设同属于某一言语社区的成员对这一语言有相同的认识 and 了解；然而，语言的空间移动研究使我们看到，这一假设并不总是成立，对某一语言的共同认识 and 了解并不是必然的，而是与交际双方的互动机制紧密相关（Rampton, 1998）。对互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能帮助我们理解在全球化、人口和资源快速流动的社会里语言生活的新问题。社会交际的互动机制应该被看作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基础，需要进一步深入、全面地研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功能”问题。海姆斯（Hymes, 1996: 3-16）很早就提醒我们需要在语言功能方面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他提出“功能相对性”的概念，即同一语言形式具有非常不同的功能，这种不同取决于语言使用的空间、怎样使用、为什么使用以及这一语言形式是否存在于说者的语言库。“功能相对性”概念对我们理解语言的移动具有重要意义（Blommaert, 2003）。在某一空间使用自如的语言形式在另一空间也许就失去效用了；在某情境下非常健谈的人到另一情境也许就变得很沉默。空间移动的轨迹同时也是影响语言资源的功能转换和价值变化的轨迹。移动性社会语言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语言功能的相对性。所有这一切将会成为现在和未来一代社会语言学者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 蔡冰 2008 语法化的社会动因——基于汉语新兴程度副词的定量考察，第六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2008年3月25-27日。

- 付义荣 2010 也谈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以安徽无为县傅村进城农民工为例,《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73-81页。
- 王玲 2009 言语社区内的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以厦门、南京、阜阳三个“言语社区”为例,《南京社会科学》第2期,124-130页。
- 夏历 2007 北京农民工语言使用研究,《中国社会语言学》第2期,145-158页。
- 徐大明 2004 言语社区理论,《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18-28页。
- 徐大明 2008 语言的变异性与言语社区的一致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78-86页。
- 徐大明 2010 《社会语言学实验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曾炜 2006 “民工潮”背景下农村方言的变化:蛇山村个案研究,《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
- 周庆生 2007 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语言环境建设报告,《中国社会语言学》第2期,1-10页。
- Agha, Asif. 2007. *Language and Soci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ommaert, Jan. 2003. Commentary: A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7(4): 607-623.
- Blommaert, Jan. 2005. *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ommaert, Jan. 2006. From fieldnotes to grammar: Artefactual ideologies and the textual production of languages in Africa. In Giandomenico Sica (ed.) *Open Problems in Linguistics and Lexicography*: 13-59. Milan: Polimetrica.
- Blommaert, Jan. 2007. Sociolinguistic scales.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4(1): 1-19.
- Blommaert, Jan. 2010. *A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ommaert, Jan & Jie Dong. 2010a. Language and movement in space. In Coupland, N. (ed.)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lobalisation*. Oxford: Blackwell.
- Blommaert, Jan & Jie Dong. 2010b. *Ethnographic Fieldwork: A Beginner's Guide*.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James, Stef Slembrouck, & Mike Baynham. 2009.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 in Contact. Continuum. London.
- Coupland, Nikolas (ed.). 2003. Sociolinguistics and Globalisation.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7/4.
- De Swaan, Abram. 2001. *Words of the World: The Global Language System*. Cambridge: Polity.
- Dong, Jie. 2009. "Isn't it enough to be a Chinese speaker": language ideology and migrant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a public primary school in Beijing.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9(2):115-126.
- Dong, Jie. 2010a. The enregisterment of Putonghua in practice.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30(4): 265-275.
- Dong, Jie. 2010b. Neo-Liberalism and the evolve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policies on migrant children's schooling. *The Journal for Critical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8(1):137-160.
- Dong, Jie. 2011. *The "Long March" to the City: Language, Discourse, and Layered Identities among China's Internal Migrants*.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 Dong, Jie & Jan Blommaert. 2009. Space, scale and accents: constructing migrant identity in Beijing. *Multilingual*, 28(1):1-24.
- Gao, Yihong. 2010. Language and identity: State of the art ad debate if legitimacy. In Lo Bianco, Orton and Gao (eds.) *China and English: Globalisation and Delimmas of Identity*. Multilingual Matters. Bristol.

- Gumperz, John. 1982. *Discourse Strate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ller, Monica. 2003. Globalization,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identity.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7(4): 473 – 492.
- Hobsbawm, Eric. 1987. *The Age of Empire: 1875 – 1914*. London: Abacus.
- Hymes, Dell. 1996. *Ethnography, Linguistics, Narrative Inequali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Voice*. London: Taylor & Francis.
- Kress, Gunther. 2003. *Literacy in the New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 Pennycook, Alastair. 2007. *Global Englishes and Transcultural Flows*. London: Routledge.
- Rampton, Ben. 1998. Speech community. In Jef Verschueren, Jan-Ola Östman, Jan Blommaert & Chris Bulcaen (eds.) *Handbook of Pragmatics*, PP. 1 – 3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Silverstein, Michael. 2006. Pragmatic Indexing. In Keith Brown (ed.) *Encyclopa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nd Edition, vol. 6: 14 – 17. Amsterdam: Elsevier.
- Wallerstein, Immanuel. 2004. *World-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Language and Movement in Space

Dong Jie Jan Blommaert

Abstract This paper identifies two paradigms for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The first one is a sociolinguistics of fixed 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in which the focus is on distribution and variation in a horizontal timeless space. The second paradigm is a sociolinguistics of mobile resources, in which “language” is seen as varying complexes of actual communicative resources, that are used, exchanged and valued in patterns of mobility, both across space and across time. This second paradigm, we argue, is the paradigm we require for developing a mature and useful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globalization; space; sociolinguistic scale; mobility; indexicality; ethnography

(董 洁 扬 · 布龙马特 Tilburg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语言舆情热点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孙曼均

提要 语言舆情蕴涵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深层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分析和研究语言舆情,揭示舆情隐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可以了解当前的社会语言生活,反观并反思我们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范。本文选取 2009 年到 2010 年三个语言热点舆情,分析语言舆情产生演化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揭示语言舆情的成因,并对国家语言政策和规范制定、推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思考。

关键词 语言舆情;社会;文化;心理;分析

1. 热点现象

舆情是“由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综合”(刘毅,2007:51)。语言舆情就是公众对语言文字政策法规、规范标准或热点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意见、态度、情绪或愿望。舆情的发生机制是一种刺激——反应机制。中介性社会事项作为刺激中介,会直接导致公众社会政治态度的产生。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制度法规、规范标准或热点问题等也是中介性社会事项,这种中介性社会事项如果影响到公众的利益或使主客体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就会对公众造成刺激,使其产生各种意见或态度,表现出各种情绪或愿望,从而导致语言舆情的发生。

2009 年到 2010 年,在汉字和汉语词汇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三个热点舆情。

1.1 《通用规范汉字表》对 44 个字形的调整

2009 年 8 月 12 日,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向社会发布《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和《关于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指出《通用规范汉字表》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配套规范,是为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适应信息时代语言生活和社会发展而研制。征求意见一开始就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有关繁体字简化字问题、异体字问题、字表的影响范围等问题都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其中 44 个汉字字形的调整是

最引人注目,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成为舆情中的焦点。在新浪网关于“你是否支持调整 44 个汉字写法”的调查中,大多数网民持不赞成意见,认为调整字形弊大于利,付出的社会成本太大,会造成使用的不便和混乱。而少数支持者认为,修改原因有理可依,调整后的字形更符合字理,更有规律。

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屏蔽网络词语

在 2010 年 3 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建议屏蔽网络不良用语,如“3Q (Thank You)、bt(变态)”,以及“囧、槩”等生造字,认为青少年长期接触这些网络语言,会产生不好影响。建议一出,迅速引发网上舆情,“屏蔽”之说更是激起网民情绪反弹。据新浪网调查显示,反对者占六成,认为语言文字是有时代特点的,网络词语是时代的记录;网络无法行使语文课本的教化作用;净化网络语言是扼杀网络民主,取缔民意。支持者则表示,反感网络词语的过度使用,应当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不能异化汉字。也有学者主张应以更开放的眼光看待、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对待它,简单言“堵”的做法在效果上值得考虑。

1.3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通知“屏蔽”字母词

2010 年 4 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向中央电视台下发通知,要求主持人口播、记者采访和字幕中,不要使用外语词及缩略词,如 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等;如遇特殊情况必须使用,要在外语词及外语缩略词后加中文解释。这一决定一经披露,立刻引起来自媒体和民间关于外语缩略语如何使用的大讨论。尽管广电总局的通知中并没有使用“屏蔽”“禁止”等字眼,其回应也称并非屏蔽和排斥外来文化,而是要求外来词语在汉语中的规范使用,很多媒体和评论仍将广电总局这一行动归为“屏蔽”“封杀”,民间也普遍反映难以接受。

据星辰在线、新浪论坛的网络调查,逾五成网友持不赞同意见。另据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2010 年 4 月 11 日的调查,不赞同意见占大多数,负面指数和热度指数基本同步。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外语缩略语是文化融合的产物,用缩略语很方便,换成纯汉语表达后冗长啰唆、不利于交流;这一禁令对整个民族的母语保护作用微乎其微。赞同意见主要是,外语缩略语的泛滥使用破坏了汉语的纯洁性,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侵略,此举是保护母语、实现文化本土化、抵制外来文化侵略的表现。中立意见则认为,对汉语中的字母词,应当采取既包容又适当制约的态度。

2. 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舆情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民众对社会现实的主观反映,是群体性的思想、心理、情绪、意见和要求的综合表现,是社会发展状况的温度计和晴雨表”(王建龙,2002)。语言文字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语言文字的热点问题往往也是社会热点问题,与公众的现实利益紧密相连。由于语言文字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语言舆情中的公众意见、态度及情绪背后也蕴涵着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深层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通过对舆情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所反映的公众各种社会心态进行分析和研究,揭示舆情隐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不仅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

握社会语言生活现状,掌握当代社会文化发展脉搏,为科学地制定语言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而且有助于准确地甄别舆情信息,深入探索舆情发生演化的规律,为积极应对并正确引导语言舆情提供预警参考。

2.1 社会因素

语言舆情是一种社会现象,分析语言舆情首先要从社会因素入手。从语言舆情发生的社会空间来看,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治上由人治政治向法制政治转型,文化上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向,家庭上由传统大家庭向现代小家庭转变。这种社会转型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增速,城镇化进程加快,但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却并不平衡,社会矛盾日益深化并逐步凸显。由于当前社会公信力有所缺失,公民表达权和舆论监督权成为舆论的敏感点,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容易激发舆情并使舆情事件放大。

在转型期和全球化的国内外环境下,我国语言生活正在急速发展变化,呈现出“后现代”和“多元文化”的特征,公众语言权利意识不断高涨,语言利益诉求不断增多,语言问题越来越多地影响到社会的诸多方面,成为现代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不断在网络上形成热点话题,引发公众广泛舆论。在这种背景下,语言舆情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些语言问题的意见和态度,而且还反映了人们对当前特定阶段社会发展状况的各种意见或态度,甚至还成为各种社会情绪宣泄的“窗口”。

从上述热点舆情中我们看到,语言文字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本来不属于大众舆论关注的范畴。但是,由于中国处于复杂的转型期,社会多元的价值观正在重塑过程中,而语言文字又事关公众的民族情感和切身利益,因此,语言文字问题也成为了公共话题和敏感话题,受到公众的异常关注。这种关注的背后折射出社会转型期的诸多变化与多元化的价值取向,隐含着公众的各种社会政治态度与社会情绪。

网络作为舆情传播的主要手段,在舆情生发演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的互联网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发展起来,并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2010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继续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网民总数达到4.57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23.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网络舆论的发达程度超过了西方国家。网络以其公开、平等、自由、交互性、数量大、传播迅速、影响广泛等特点,促进了公众的畅所欲言和言论的空前活跃,使其成为当今社会民意的重要表达手段和主要渠道。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网络舆论的空前兴盛,构成了语言舆情产生、发展并日趋活跃的大背景。

当前语言舆情构成的主体基本上是网民,其群体特征表现为:以年轻人为主体,35岁以下者占网民总数的80%以上;学历结构呈低端化变动趋势,初中高中及大专和本科以上学历者约各占网民总数的1/3,适龄青年普遍有受教育背景。这一年轻群体眼界开阔,思维敏锐,关心社会,关注时政,重视生活质量与利益分配,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们通过网络公